

三史斋论史

吕锡生 著



香港文学报社出版公司

三史斋论史

吕锡生著

书名：三史斋论史

著者：吕锡生

责任编辑：顾吉辰

执行编辑：吴胜英

出版发行：香港文学报社出版公司

社址：香港九龙土瓜湾下乡道36号华强大厦2字楼B座

电话：23305870

印刷：无锡市电脑排版印刷所

开本：大32开（14cm×21cm）

字数：234千字 印张：9.375

初版：2001年3月8日 印数：500本

国际统一书号：ISBN：962—962—057—x

定价：2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大运河史》编撰会议



1991年10月9日《中国大运河史》第一次编撰会议（无锡教育学院希望楼）

前排左至右 谢宝耿、施宜园、陈壁显（主编）、沈青松、朱伦昌、谢菊宝、吕锡生

后排左至右 严桂林、董凯、李志庭、戈春源、顾吉辰、徐晔、曹金华

读《史记》《徐霞客游记》之后（七律）

人间初文自史地， 河图洛书显文明。
西汉雄文尊龙门， 晚明奇著重梧塍。
史叙人事三千载， 地记山川十万程。
立言著述千古事， 铸就中华民族魂。

辛巳孟春 于无锡





《大运河史》执行编委吕锡生代表编委会送聘书给侯仁之教授



《大运河史》执行编委吕锡生代表编委会送聘书给陈桥驿教授



与“秦俑之父”合影

《三史斋论史》序

顾吉辰

即将刊行的《三史斋论史》一书，是著名历史学家、无锡教育学院教授吕锡生先生积二十年之功完成的一部研史论著，也是他长期学习和研究秦汉史、明史、地方史以及史学理论的辛勤结晶。

这部学术著作，收集了作者自 1982 年至 2000 年间公开发表在国家级、省市级学术刊物上的论文共 40 篇。按内容大致可分史学理论、司马迁及其《史记》、徐霞客及其《游记》、太湖流域与大运河沿岸区域研究等几个方面。从论著内容考察，是书有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

首先，史、论并重，卓有创见。作为一部颇有份量的学术著作，对历史人物以研究是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仅停留在发掘资料、考辨史实上显然是不够的，必须对所研人物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作出一个中肯恰当的论说，对其思想体系进行理论总结，如此方能将研究推上一个新的高度。以这点来审观本书，则有其可称之处。如对司马迁历史功过的把握上，不毛求细致，而是取其大节，指出司马迁最大的历史功勋，在于维护西汉王朝的统一和政局稳定，在于对分裂行径的痛斥和坚决反对。作者站在更高的历史角度来俯观汉武帝时代的社会现实，可谓相当成功。徐霞客政治思想、旅游思想也是本书研论的重点。作者指出，明万历以后社会风气发生了巨大变化，由空谈性理转入经世致用，崇尚实学的思潮逐渐形成。徐霞客的思想便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时代特色。作者还将徐霞客的思想与西汉的司马迁联系比较。这种比较联系的研究方法，开阔人视野，启人思路。此外，对徐霞客与东林党的关系、徐霞客与长江文

化、徐霞客与历史学等诸多问题，作者也申述了自己的见解。这种见解也是相当精辟，颇有创新，体现了一位徐学专家扎实的功力和深厚的学术造诣。

其次，资料丰富，考据精审。有关徐霞客的家史资料既少且散，搜集、整理极其困难，对此作者付出了相当大的精力，广览史籍，波沙觅金，除了从《明史》、《国榷》、《明通鉴》、《宋史》等常用史籍耙梳资料外，作者还审读了为数众多的地方志、家谱等，发掘了《徐霞客家传》稿本，并进行了整理、点校、考证、注释和出版。同样，他对汉武帝、司马迁、陆贾、卫青、两汉后妃等也深入研究，认真阅读《史记》、《汉书》等名著，旁征博引，努力做到言必有据，无证不信。

再次，开拓研史领域，服从“四化”建设。研究历史归根到底要为社会现实服务，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服务。作者始终恪守这个研史原则。作者生长在太湖与大运河交汇地无锡市，是太湖水与大运河水哺育了他，造就了他。因此，他对家乡的太湖和运河情有独钟，再加上太湖流域和大运河千里沿岸的悠久历史、辉煌文明，激发了作者自觉提起时代的画笔，去精心、真实地描述太湖、运河区域和乡家无锡辉煌的昨天、奋发的今天和美好的明天。由作者亲自策划、执编的《中国太湖史》、《中国大运河史》、《无锡通史》三部煌煌巨著，已经出版面世和即将出版，这是世纪之交开拓区域专史研究的一种尝试，这也是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的一种实践。

我与吕锡生教授相识，是在 1983 年在长春召开的第五次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上。当时我们两人同住一间房间，朝夕相处，说话投机，十分有缘。在阅读了他提供大会的论文，感到论述精深，见解独到，令我与其他与会者刮目相看。当时他在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会后，陆续谈到他研论史学的佳作，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后，他经过努力，圆了叶落归根的梦，由金华市的浙江师大调入无锡教育学院政史系工作。其间曾数折柬于我，商兑学术，乃知他

针对家乡无锡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专门对乡邦文化进行全力的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为学术界一致称赞的《徐霞客家传》、《徐霞客研究》、《徐霞客与江苏》、《中国太湖史》、《中国大运河史》等多种论学专著，而这部《三史斋论史》是他奉献学林的又一力作，它的出版我相信一定会受到学术界的欢迎和赞誉。

吕锡生教授嘱序其书，因就所可知，叙述于上，尚望究心地方史事者其论定之。是为序。

二〇〇一年二月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自序

日月倏忽，人生苦短。岁近古稀，本当安度晚年，惜习性难违，笔耕不辍。更以史识自负，每有迁、固之志，意欲撰史存世。退休至今，数年间赖无锡陈璧显、宗菊如诸领导的支持，沪地吉辰教授、澄江仲良兄的赞同，先后组织倡修了《中国太湖史》、《中国大运河史》、《无锡通史》(包括《江阴通史》)，并蹈居三史执编之职，更仗京、杭、沪、宁、苏、锡，徐、扬诸史地学界同志的分工合作，五年之间三史陆续告成，并由中华书局精装出版。此本史界之大事，锡城之盛举，然由我担之任之，实三生之有幸。我每念文章之事，贵乎选题，尤重创体。身处无锡一隅之地，欲撰传世之作，固亦难矣。思之再三，唯太湖、运河结连锡境，且为天下之穴脉，真天地间不可无此书也。查阅资料，尚无前贤创制。乃发凡起例，捷足先登。晚年成此壮举，史识乎！天幸乎！

我与史学，实无心而成之。祖上出自江阴小镇璜塘农家。上无读书之人，家无坟典之藏。出生之际正当日寇蹂躏中国之秋，故自幼在兵荒马乱中度过。少年时，目睹日军之凶残，民国之腐败。亡国恨、政局昏，深深铭刻在幼小的心灵上。

入学之后，爱看连环画小书。镇上有宋福隆者，以租书为业，其藏书之丰，乡间罕有其匹，神怪志异，历朝故事，莫不备列。小学四年级时，我已看完了他的一屋小人书，对中国历代史事，似乎有了朦胧的认识。不过谈到我与历史结缘，恐怕还在于我的祖父，他可算得上我的启蒙老师。祖父是个普通农民，目不识丁，壮年时因割草伤足成残。平素喜喝茶听书，回家把故事讲给我听，久而久之，培养了我听故事的兴趣，加上我又爱把听到的故事，与连环画对照，如果书上有的，便信以为真。看小说在小学毕业前几乎成了我的唯

一嗜好，终日沉浸在《三国演义》、《说唐全传》、《大明英烈传》一些历史小说之中，并且熟记这些演义中的帝王将相的名字。小学毕业后，经人荐到上海一家橡胶厂当徒工，这期间火神三临此厂，祖母、母亲因以为惧，便将我接回乡下，结束了短短一个月的学徒生涯，最后到离家10里的尚仁初中读书。进入中学后，与篮球结了缘。初中毕业没有去考高中，而是到青阳中学一年制的高级会计班学习，目的是想拿张中专文凭，日后可以有资格考体专，以圆专打篮球的梦。谁知苏南苏北学校合并之际，又把我推到了扬州财经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长江砖瓦厂计划科工作，此时打篮球几乎成了我的另一职业。但统计工作则非我之所愿。1956年国家动员在职人员考高校，我有幸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这是第一次实现了我幼年的人生理想，也遂了上大学的愿。可是进校仅半年，1957年春天，由号召大鸣大放大字报一转为反右斗争。校园风云突变，当时之际，除了极个别“左”派外，广大师生言者有罪，人人自危。反右结束，便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校园内又掀起了反对白专道路和大炼钢铁运动，四年大学生活就是在这样的阶级斗争的风暴中度过的。毕业后统配到远离上海五千里以外的云南教书。这次分配是我一生中的一个大转折，也是最大的打击，因为人未动身，粮户已经迁走。在当时，若不服从分配，顷刻便成黑人黑户，劳动教养的命运随时伺候着自己。我面对回家当农民而不可得的情况下，孑然一身，远走天涯，家中年老祖母也不得一见。亲情、乡情从此隔绝，人生遭此突变，仿佛生离与死别。在云南16年，每临春风而思江南，望秋雁而盼东归。思乡之情未尝一刻而忘也。调归之事，几乎左右了我日常的工作与生活，也成了我唯一奋斗目标。每遇与我同样命运的人，言谈之间莫不为之痛心疾首，可见胡马越鸟之思，人心皆同。

云南是个好地方，后来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本来到这里工作也未尝不可，祇是那种强制性的能去不能归的方式确实使人难以接

受，且家中年老的祖母眼望欲穿，何况我去的曲靖地区又不缺教师，我决心要调回家乡。同时我又得面对现实，所以在这 16 年中，完全是凭仗意志、毅力和决心，从克服语言的障碍开始，传奇式地应付着多变的工作。在 16 年中，从做教师、班主任转图书馆、总务处、教导处，再到下乡搞四清，种样板田、救灾荒，以及搞巡回医疗、中草药展览、中西医结合，甚至到上海搬迁虹口儿童医院，负责药检所工作等等，其间还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工作和生活的实践，培养了我适应环境、思考问题、处理人事的能力，同时，也迫使 I 从实践中提高观察力，从书本中寻找智慧。荀况的《劝学》篇和韩非的《说难》篇应该说对我应付周折，战胜困难，起到了启示的作用。

云南曲靖组织上曾二度帮助我与家乡商调，可是均以“难以安排”为由而未能如愿，直至 1976 年 6 月方得调浙江丽水地区，得以略解了思乡之渴。1978 年全国高校恢复招生，需要教师，我便调入浙江师范学院历史系担任《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历史文选》课的教学。这时，我已是 45 岁的人了，经过前半生的颠沛跋涉，至此方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一份较为理想的工作。对于历史教学和研究，我只能算是半途出家，原因是基础不扎实，另一方面前半生几乎完全脱离专业。但后来不仅能胜任教学且不断有论文发表，这不能不归功于前半生的社会实践。正是那种流亡式的工作和生活实践，以及刻骨铭心的思乡焦虑，磨砺了我的人生，它不仅使我顺利地度过了一个个难关，也使我学会了看问题和写文章的观点、方法。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后半生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学校里因我担任《中国历史文选》和《史学概论》的教学，迫使我只得自学中国史学史和历史认识论、方法论，这样便提高了鉴史和撰史的能力。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镇江工作的无锡人邓鸿勋任无锡市委书记后，他以切身的体会，方打破那种狭隘自私、任人唯亲、闭关自守的人事观念，我这个年过半百的外地游子终于在 1985 年作为引

进人才，叶落归根，调无锡教育学院历史系任教，这为我一生追求归乡的最终目标划上了句号。

无锡是座经济发达的地级城市，素以重经济轻文化而闻名。在这样的氛围下，我调回故乡后能做些什么呢？考虑再三决定从原来的《史记》研究，转入《徐霞客游记》研究。这个选择是根据自身条件和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定的。因此一到校就向当时力图振兴教育学院的领导建议成立“徐霞客研究室”，以研究《徐霞客游记》扩大学校的影响，得到了领导的支持。历经数年努力，先后出版了《徐霞客家传》和《徐霞客研究》，使无锡教育学院成为改革开放后全国最早出现的徐学研究基地之一。1994年我退休后仍坚持徐学的研究，出版了《晴山堂法帖》和《徐霞客与江苏》。并从史学的角度上，进一步去实现编史的愿望。根据无锡的实际以及古今史籍流传的生命力的强弱，确定了编撰《中国太湖史》和《中国大运河史》的选择。因为在无锡这块土地上，没有再比这太湖和大运河与之休戚与共、盛衰相依的了。太湖和运河能突破无锡这个小区域范围，加之又是史学上填补空白之作，其价值远远超出了地方史志的值域。为了保证编史质量，便继承前后两司马的创新精神和会通精神，根据河湖的自然特性，在确定编写大纲时，设第一章专叙自然环境史，同时又大胆设计撰写现代史，更增设了展望未来的篇章。再又从河湖地带物色志同道合，学有造诣的专家分工编写，又经数年，终于有成。

在三史陆续出版的今天，故不辞浅陋，将后半生所写的百余篇文章，挑选几十篇辑成一书，题名《三史斋论史》。尽管论史未能登堂入室，但为了作一生热爱史学之证，亦为了半生心血所凝，故编集成册，略慰平生，且赠知己。特为之序。

三史斋主人璜溪吕锡生
公元2000年12月5日

三史斋论史

目 录

序.....	顾吉辰(1)
自序.....	(1)
1. 论《史学概论》研究的对象和内容	(1)
2. 谈历史研究的出发点	(8)
3. 漫谈研究历史的几种技术性方法	(16)
4. 史体教学在《历史文选》课中的地位	(29)
5. 论《嘉定屠城纪略》作者的史德与史识	(36)
6. 简评《吴氏大统宗谱》	(43)
7. 梧塍《徐氏宗谱》的源流和特色	(47)
8. 写在《中国太湖史》编撰前夕	(59)
9. 关于《中国大运河史》的立论问题	(65)
10. 关于《无锡通史》的编撰意见	(69)
11. 正确处理感情与史实的关系	(71)
12. 关于《牧誓》的成书年代问题	(80)
13. 论陆贾在汉初的功绩	(92)
14. 略论卫青的出身、战功、将才	(104)
15. 司马迁宫刑析疑	(114)

16. 略论司马迁的荣辱观	(116)
17.《史记·货殖列传》中的经营之道	(127)
18. 从西汉帝后婚姻看封建社会早期的婚姻观	(132)
19. 略论东汉的儒学才女	(141)
20. 论赵佗在我国民族融合中的贡献	(151)
21. 从民族起义到民族暴乱——评东汉二征暴动的性质…	(163)
22. 山越在东吴立国中的作用	(169)
23. 关于畲族的起源	(180)
24. 再论畲族的起源	(185)
25. 畲族迁移考略	(194)
26. 明清时期畲族对浙南山区的开发	(203)
27. 徐霞客籍贯考	(207)
28. 徐霞客与纳西族首领木增的友情	(214)
29. 徐霞客与历史学	(221)
30. 徐霞客对滇池旅游圈的考察	(230)
31. 略论徐霞客的闽游情结	(238)
32. 徐霞客衢州贊奇观	(246)
33. 徐霞客的婚姻悲剧	(251)
34. 徐霞客与长江文化	(256)
35. 徐霞客盘山游考	(271)
36. 徐霞客与晋地山水	(275)
37. 我国封建社会前后两大文化巨人——司马迁与徐霞客	(281)
38. 明代两大探险活动之异同	(292)
39. 卫青(电影历史剧本)	(303)

论《史学概论》研究的对象和内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史学界开始了对史学理论的探索。自1983年来，出版的史学理论著作“概论”已有多种，且各有所长，情况十分可喜。但看其名目，或曰《历史科学概论》^①，或称《史学概论》^②，或名《历史学概论》^③。别其内容，则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为历史认识理论，一为历史编纂理论。同为一门历史学科的“概论”，为何从名称到内容会有如此的差别？这说明史学界目前对于这门学科所研究的对象、性质、任务和范围尚未有统一的认识，亟待大家讨论解决。我在这里试就上述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意见。

一、“史学”、“历史学”、“历史科学”实际上是同一概念

“史学”、“历史学”、“历史科学”是当前出版的“史学概论”著作里所使用的三个名称。对于史学理论是否一定要冠以“科学”，本书对此暂不展开讨论。这里只对“史学”与“历史学”两词的含义进行一些辨析，看看它们到底有没有区别。理解“史学”与“历史学”的关键在于对“史”和“历史”含义的理解。众所周知，我国古代的“史”字，本属一个模糊性的措辞，是一个多义词，它可以指史事，也可以指史书乃至史官。而“历史”一词，则出现较晚。“历”、“史”二字连用，始于清代末年，最早见于废科举、兴新学后学校里的课程表上，把“历史”称作一门课。从字义上讲，古文的“历”，其字形为“厃”，“厃”的意思，据《说文解字》，是从二个“禾”字，古人以“禾”纪年，禾

^① 葛懋春、谢本书主编《历史科学概论》，1983年山东教育出版社。

^② 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1983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吴泽主编《史学概论》，1985年安徽教育出版社。

^③ 田昌五、居建文著《历史学概论》，1984年河南人民出版社；赵吉惠著《历史学概论》，1986年陕西三秦出版社。

一熟为一年，从又禾表示不止一年。所以“历”表示过去的陈迹，和“史”是同义字。可见，“史”前加“历”，词义未变。“史”也就是“历史”。当然，在习惯用语上，“史”与“历史”尚有细微的差别，如“史”可指史事、史书、史官，却没有人把史官呼为“历史”的；又如我们说二十四史，没有人认为是指“二十四历史”，而只认为是指二十四部史书。但这些仅是用语上细微的差别，并不影响“史”与“历史”同义。

既然“史”即“历史”，两者所研究的对象，所形成的理论，当然就不分彼此了。“史学理论”自然也就是“历史学理论”。但今天史学界有些同志为了区别研究历史的理论和研究史籍的理论，却把研究历史的理论称为“历史学理论”，而把研究史籍的理论称为“史学理论”，从而把本属同一概念的“历史学理论”和“史学理论”说成是两个本属不同的概念，这样，势必造成对研究历史的理论和研究史籍的理论，这两种不同学科理论的混淆。产生这种混淆的原因，除了不考虑上述“史”与“历史”同义外，还在于“史学”一词有它广义上的理解。从广义上讲，凡属研究历史或史籍的学问统统可归之为史学，如考古、史料、历史编纂、史学史、史评等等都属史学范畴。历史编纂理论可称为史学理论，历史认识理论何尝不可以称为史学理论！由于“史学”一词的广义用法，学者在使用“史学”两字作“概论”的前置时，必然又会出现第二个问题。那就是“概论”的对象和内容问题，它到底是属历史理论还是历史编纂理论。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或是历史各分支的综合学问？由于大家的认识不一，于是使“概论”的内容上出现了对不同的历史学科的混杂，最终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史学概论”编成了一部史学各学科的综合。所以，我们在编纂《史学概论》之前，有必要把“史学”、“历史学”、“历史科学”这些概念搞清楚，以免因名称概念上的含糊而造成体例、内容上的混淆。

二、必须正确区分历史认识理论和历史编纂理论

历史认识理论和历史编纂理论研究对象不同，因而是两门不同性质的学科，前者研究的对象是历史，后者研究的对象是史籍。为了正确地区分它们各自研究的范围和内容，不能简单地采用“历史学理论”和“史学理论”两个概念本属同一的词去区别这两门不同的学科，而应当选择能明确反映这两门不同学科性质的名称。

历史理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具体地讲，包括历史研究的对象、历史发展的动力、形成及规律的探讨，涉及到人民群众的作用、历史人物的评价，以及民族的形成等等一系列指导历史研究的重要理论观点。另外还有历史研究所采用的各种不同的方法，其内容可以包括古今中外史学工作者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从传统的考据法、考古法，到现在所采用的阶级分析法、历史比较法、计量法、心理分析法、系统方法等等。历史认识论与方法论构成了历史理论的主要内容，它无疑是史学理论的主干，所以中外史学界通常把历史认识理论称之为“史学理论”。至于历史编纂理论，它所研究的对象只能是史籍。这门学问，从广义上讲，确实也是史学理论的组成部分。不过，从狭义上讲，它与历史理论不同，它并不指导人们研究历史，而且在理论内容上和理论层次上所占的比重都不是史学理论的主干，所以它就不能笼统地称之为史学理论，而只能称为历史编纂理论或历史编纂学，使用历史编纂理论这个名词区别原来“史学理论”的名称，不仅可以避免历史和史籍这两门不同学科理论之间的混淆，而且也易于为人们理解和接受。

历史编纂理论具体的内容主要包括史家观点、史学流派、史籍体例等等的理论。至于在编撰方法上则有史家直笔与曲笔、直叙与插叙、夹叙与夹议及互见法等等。总之，不论在内容上和方法上，其理论体系具有本学科鲜明的特点。它是一门与历史理论十分接近的学科。但如果从两种理论体现的层次关系看，历史理论属于高层次的研究，史籍理论则属于低层次的研究，历史理论是宏观理论，